

精英衝突與經濟發展

● 劉娟鳳



瓦爾德納 (David Waldner) 著，劉娟鳳、包剛升譯：《國家構建與後發展》(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

國家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是政治經濟學的核心主題，也是現實生活中最常被討論的話題。吉林出版集團出版的「比較政治經濟學書系」包含了這個領域內最主要的譯著。其中，瓦爾德納 (David Waldner) 的《國家構建與後發展》

(*State Building and Late Development*，引用只註頁碼) 一書，力圖用新制度主義的視角來解釋後發展國家經濟發展的差異。瓦爾德納副教授任教於美國弗吉尼亞大學政治學系。他還擔任弗吉尼亞大學中東研究項目的主任。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發展中國家的後發展問題，研究範式是新制度主義。

作者在第一章中概述了自己的主要觀點和邏輯框架。該書不只探究了後發展國家經濟發展差異的原因，而且還描述了一個完整的因果鏈條，將精英衝突的強度與經濟發展的結果聯繫起來。這個因果鏈條包含了五個關鍵的要素及其構成的四個核心環節。這五個要素分別是：

(1) 精英衝突的強度；(2) 國家構建；(3) 早熟的凱恩斯主義 (precocious Keynesianism)；(4) 發展的集體困境；(5) 經濟發展。四個核心環節是：(1) 精英衝突的強度；(2) 該強度決定了精英是否會吸納平民來實現國家構建；(3) 在這個過程中形成的制度安排決定了國家在隨後的經濟發展中能否解決發展的集體困境；(4) 從而決定經濟發展的結果。

國家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是政治經濟學的核心主題，也是現實生活中最常被討論的話題。瓦爾德納的《國家構建與後發展》一書，力圖用新制度主義的視角來解釋後發展國家經濟發展的差異。

低強度的精英衝突使精英能夠把下層階級排除在外，建立一個小範圍的統治聯盟，首先完成國家的轉型，使國家具備發展經濟的獨立能力，最終實現持續的經濟發展。

在國家構建的過程中，「激烈的精英衝突迫使鬥爭中的精英的某部分去吸納平民：國家與平民階層談判，通過交換物質利益來獲得政治支持」（頁42），國家構建與吸納平民的同時發生，使國家轉變為一種早熟的凱恩斯主義國家，這種類型的國家有能力克服經濟發展中的「格申克龍集體困境」（Gerschenkronian collective dilemmas），但是卻無法克服甚或加深了「卡爾多集體困境」（Kaldorian collective dilemmas），即能夠加大投入卻無法提高效率 and 技術，其結果就是造成不可持續的發展。與此相對，低強度的精英衝突則使精英能夠把下層階級排除在外，建立一個小範圍的統治聯盟，首先完成國家的轉型，使國家具備發展經濟的獨立能力（即所謂的「發展型國家」），它既能克服格申克龍集體困境，同時也能克服卡爾多集體困境，最終實現持續的經濟發展。

書中對整個因果鏈條中的多個關鍵概念進行了新的界定：

(1) 精英衝突的強度。作者對「精英衝突的強度」進行了簡單的二分。高強度的精英衝突指的是衝突不僅威脅到精英的短期物質利益，而且威脅到他們維持精英地位的長期能力（頁34），而低強度的精英衝突則沒有構成以上威脅。

(2) 國家構建。這裏指的是國家從間接統治向直接統治的轉型，即國家脫離地方精英而通過制度化的組織能力來統治社會。國家構建包含兩項任務，即「建立維持直接統治型國家所需的行政機構和管理大規模的平民政治」（頁31）。

(3) 吸納平民。通過高水準的轉移支付或補償措施，即分配性財政手段，精英與平民階層建立起廣泛的跨階級聯盟來鞏固自己的政治權力和地位（頁34）。

(4) 早熟的凱恩斯主義國家。這是國家構建的一種特定模式，即建立廣泛的跨階級聯盟，將國家從間接統治轉變為直接統治的結構，這個過程發生在處於工業發展初期的社會中。作者將這個概念看作一種描述性詞彙，用來描繪高水準財政轉移支付的制度和政策，並與發展型國家區別開來（頁58）。

(5) 格申克龍集體困境。這裏指的是資本積累以及對新產業投資的困難（頁191）。例如鐵路建設需要大量的資金支持。作為第一個成功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早期的鐵路主要是由私人公司投資經營的，跟隨其後發展的德國則面臨着投資資金不足的問題。在解決這個問題時，德國政府開始為修建鐵路提供財政支持。

(6) 卡爾多集體困境。這裏指的是使現有的工廠更具生產效率並在產品鏈中向上轉移時遭遇的困難（頁194）。例如二十世紀60年代，土耳其的卡車製造業得到了大量的投資，但是所有工廠的產能利用率平均只有35%，生產技術的落後使得這些工廠達不到最小的規模經濟。

(7) 經濟發展。作者將其定義為經濟結構和過程的變化，這種變化提高了創造價值的能力（頁182）。它包括了四個維度：創造人均國民收入的實際增長的新投資；部門和

產業關聯的建立；任何既定產業部門中生產過程的生產效率的提高；轉向較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頁186）。

上述整個因果鏈條包含了兩個核心的因果機制。第一個因果機制是精英衝突的強度決定了國家構建的制度結果；第二個因果機制是國家的制度框架決定了經濟發展的結果。因此，全書分為兩大部分來展示從精英衝突的強度到經濟結果的鏈條。

一 精英衝突與國家構建

該書第一部分包括第二章到第六章的內容。第二章闡述了後殖民地國家構建的過程（頁20）。如前所述，作者對「國家構建」進行新的界定，即國家從間接統治向直接統治的轉型。這個過程實際上就是中央的國家精英取代地方精英直接統治整個國家。國家構建的兩種結果分別是：制度網絡的建設取代了貴族並將國家與各社會階層和集團聯繫起來；同時，國家對公共物品的供應擴大了，尤其是國家承擔了建設基礎設施、調控經濟和管理本國與全球經濟關係的職責（頁27）。在實現國家轉型的過程中，後發展國家在很短的時間內面臨着根本性的挑戰，包括：建立中央權威的制度、發展健康的經濟、處理與全球經濟的關係，以及建立穩定的政治秩序，包容精英和非精英行為者（頁37）。

在這樣的背景下，精英衝突具有強烈的分化性。當衝突足夠激烈

時，精英因迫切需要獲得和維持政治權力而不得不與平民階層結成聯盟。這種選擇使國家與社會形成了一種「支持—庇護主義」（constituency clientelism）的關係，即國家被社會俘獲。這個過程包含了高水準的轉移支付，即收買政治支持的代價。作者提出，在後發展國家中，國家構建、精英衝突、大眾政治與工業化被壓縮到非常緊湊的時間之內，它們發生的先後順序決定了國家的核心組織和制度架構。國家轉型與吸納平民同時發生所帶來的制度結果，不同於這兩個過程先後發生時產生的制度結果（頁38）。國家構建與平民吸納的同時發生導致了官僚機構和公共政策的政治化。

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作者選取了土耳其和敘利亞兩個案例研究來證明上述機制的存在。敘利亞和土耳其在很多重要的變項上都不相同，包括：政體類型、產權體制、精英意識形態、外部局勢威脅的程度、軍事開支、外國直接投資、技術來源、族群分歧的政治化、石油資源、殖民歷史等（頁259），但這兩個國家卻擁有相似的經濟結果。作者採用的是最相異的案例比較研究方法，但它本質上也是一種求同法。

土耳其的國家構建過程與民主政治的轉型是同時發生的，其標誌是1950年民主黨贏得了大選。民主黨是通過建立跨階級聯盟實現這點的。但是這個民主體制從1950到1980年共發生了四次軍事政變，直到1983年才重新回歸民主。政治動蕩的過程表明了精英衝突的激烈程

在後發展國家中，國家構建、精英衝突、大眾政治與工業化被壓縮到非常緊湊的時間之內，它們發生的先後順序決定了國家的核心組織和制度架構。國家構建與平民吸納的同時發生導致了官僚機構和公共政策的政治化。

作者認為精英的衝突激烈才會帶來對平民的吸納，但敘利亞的案例可能恰恰相反，平民的政治參與並不是精英衝突的結果反而是其原因。這意味着，作者選擇精英衝突強度作為自變量或許是有問題的。

度。精英階層不斷地與平民階層組建聯盟，其中包括農民、工人與商人，同時這也是精英不斷地吸納平民和收買平民支持的過程。土耳其的官僚機構也在政治的劇烈變動中失去了獨立性，變成了政黨分肥的工具。

與之相反，敘利亞在脫離法國殖民統治之後，社會中的各個階層都逐漸將控制國家視為維持現狀或重塑敘利亞社會與經濟的必要條件。新的精英階層出現並成為土地寡頭的競爭者（頁92）。代表新精英的改革聯盟與土地精英之間的衝突最終以1963年的軍事政變爆發。包含了各種派別的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執掌政權，但理念的分歧與派別鬥爭卻導致了持續的內部政變。不同的族群也在為爭奪政府權力而鬥爭（頁97）。此外，新政權也將官僚機構納入自己的控制中，為政權的支持者提供就業機會。

作者指出，在這兩個國家中，由於吸納平民和國家構建過程同時發生，國家構建的聯盟使得政府不得不全面地干預經濟，通過轉移支付和補償的方式來獲得政治支援，並最終形成了早熟的凱恩斯主義國家。

第五章描述了敘利亞和土耳其在國家構建中形成的制度框架。在這兩個國家中，官僚機構都是政治化的，因而不能像一個有效的發展型機構那樣有所作為；財政政策是分配性的，決定了這兩個國家都嚴重依賴於不可靠的外部資源和通貨膨脹政策的結合來彌補財政赤字；國家經濟干預主要是通過保護支持

者免受市場異常波動之害來迎合「支持一庇護主義」的需要（頁147）。

第六章考察了韓國的國家構建過程，着重研究低強度精英衝突的制度結果。作者以韓國作為反案例來證實精英衝突的影響作用。韓國的精英階層也是分化的，但更多的是精英之間的內部競爭（頁158），而無關精英的存亡問題。同時，朴正熙政府（1961-1979）還抵制住了平民的政治參與要求，成功地壓制了下層階級的動員。韓國的官僚機構保持了其獨立性，同時國家控制了財政政策與金融體系，這為發展型國家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條件。

在這個因果機制中，精英衝突的強度具有決定性的影響。遺憾的是，作者對精英衝突強度採取的非常簡單的強弱二分法，只不過是一個描述程度的概念。只有當衝突產生的原因是由於精英的直接物質利益及其長期的地位基礎受到了威脅時，作者才將精英衝突界定為「激烈」（頁158）。這種描述性的語言使「精英衝突強度」變成了一個不甚明確的概念。其實，從傳統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過程中，任何國家的傳統精英都會面臨這種威脅，因此精英衝突都可能是激烈的。

在重視精英衝突強度的同時，作者強調了對平民的吸納與國家構建的先後順序問題。作者認為精英的衝突激烈才會帶來對平民的吸納，但敘利亞的案例可能恰恰相反，平民的政治參與並不是精英衝突的結果反而是其原因。這意味着，作者選擇精英衝突強度作為自變量或許是有問題的。在不少後發

展國家中，精英是通過吸納平民來影響國家構建，那麼很有可能精英吸納平民才是問題的關鍵。

此外，作者還部分地解釋了韓國精英衝突不激烈的原因，即政治精英的社會同質性限制了精英衝突的強度。作者認為，韓國的政治精英大多還是將其精英地位歸功於他們在政治組織中的地位（頁170）。換句話說，韓國的精英更多是指官僚，而敘利亞和土耳其的精英則還包括地主與商人等有產階級。精英在兩組案例中的差異，使讀者不得不思考書中所說的「精英」到底是指哪些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書英文版中，台灣地區也是一個重要的對比案例，但是由於特殊的政治原因，所有關於台灣地區的內容在中譯本中已全部刪除（最集中的部分，參見David Waldner, *State Building and Late Developme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8-31），實屬可惜。

二 制度與經濟發展

該書第二部分包括第七章到第九章的內容，集中探討了制度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從作者提出的因果機制來看，制度的好壞決定了經濟發展的好壞。在第七章中，作者在重新界定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指出，後發展國家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在於能否解決格申克龍集體困境與卡爾多集體困境。本質上，這兩個困境都是集體行動的困境。要解

決這兩個問題都需要國家的干預，但是，植根於不同制度框架中的不同形式的國家經濟干預會帶來不同的經濟結果（頁203）。簡而言之，在國家構建過程中形成的制度安排決定了國家干預的形式，進而導致了最終的經濟結果。

該書的第八章詳細闡述了早熟的凱恩斯主義國家如何解決這兩個發展困境。土耳其與敘利亞都在短期內促進了投資，實現了投資的增長與要素的投入，但是它們都未能持續地提高生產效率和技術，始終是低附加值的生產國。因此，它們沒有能夠實現真正的發展。由於早熟的凱恩斯主義框架的存在，這兩個國家反而陷入了財政危機，不得不在1980年代實行經濟改革。

第九章研究了土耳其與敘利亞的經濟改革。由於既有制度框架的存在，精英選擇的經濟改革戰略都與聯盟政治交叉在一起，這使改革戰略極大地受到以前政治經濟狀況的約束（頁237）。即使他們採納了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策略與經濟自由化的政策，但是在經濟發展的四個維度上，至少有三個都存在發展不足的狀況。

三 結語

總體來看，作者在該書中用精英衝突的強度來解釋制度的產生，然後用制度來解釋經濟發展的結果。根據作者的觀點，精英衝突強度所帶來的精英的理性選擇，應該是隨着成本收益的計算而變化的。因此，

根據作者的觀點，精英衝突強度所帶來的精英的理性選擇，應該是隨着成本收益的計算而變化的。這意味着制度並不是甚麼可靠的變項，它只是理性選擇的結果。這種中介變項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令人懷疑。

在某種程度上，這意味着制度並不是甚麼可靠的變項，它只是理性選擇的結果。這種中介變項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令人懷疑的。該書至少涉及了四個方面的制度：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官僚機構、財政與稅收、國家的經濟干預。但究竟哪些制度對經濟發展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儘管在研究方法和理論框架上，該書有其不足之處，但是書中涉及的兩個核心問題卻是比較政治經濟學中最重要的議題，足以引發我們對後發展國家的進一步思考。對於後發展國家而言，過早的民主化是否會阻礙經濟發展？其制度的形成與經濟的發展僅僅是由精英的選擇所決定的嗎？

新發現的張學良

● 劉 岩

現今海內外研究張學良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對張的評價也多是陳詞濫調。《劫蔣者之夢》對既有史料重新梳理之後，對張有了與眾不同的解讀，尤其是對西安事變進行了鞭辟入裏的分析，廓清了許多歷史真相。



陳守中：《劫蔣者之夢：新披露的西安事變內幕》（紐約：明鏡出版社，2010）。

張學良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一位傳奇人物。與其早年的叱吒風雲相比，晚年的囚禁生涯則不免顯得落寞。在中共官方的評價體系中，張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雖然他在「九一八事變」中有過不太光彩的表現，但憑其在西安事變中的「豐功偉績」，他還是以「千古功臣」、「民族英雄」的形象出現在世人的面前。

現今海內外研究張學良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然而對張的評價也多是陳詞濫調，尤其是中國大陸學界因囿於官方意識形態的窠臼而難以產生真正有價值的著作。2010年，旅美學人陳守中著成了《劫蔣者之夢：新披露的西安事變內幕》（以下簡稱《劫蔣者之夢》，引用只註頁碼），對既有史料重新梳理之後，